

魯迅回憶錄

上海文艺出版社

魯迅
回
憶
錄

巴金 冯至 黄源等

责任编辑：胡从经

张辽民

装 帧：朱展程

鲁迅回忆录

二 集

本 社 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75 插页 2 字数 248,000

1979年6月第1版 197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0,000册

书号：10078·3071 定价：1.15元

DE49/02

目 录

鲁迅与沉钟社·····	冯 至 (1)
鲁迅先生与《译文》·····	黄 源 (13)
回忆导师鲁迅二三事·····	白 曙 (23)
鲁迅和方志敏的一段往事	
——纪念鲁迅诞生八十周年·····	缪 敏 (29)
永念不忘的一件事·····	李宇超 (34)
鲁迅二次见陈赓·····	楼适夷 (38)
追忆鲁迅先生“北平五讲”前后·····	陆万美 (43)
回忆鲁迅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	赵家璧 (54)
鲁迅先生的演讲·····	郑伯奇 (72)
忆鲁迅先生·····	侯 枫 (76)
回忆鲁迅先生二三事·····	许幸之 (79)
鲁迅和易俗社·····	孙伏园 (82)
记鲁迅先生选苏联版画·····	赵家璧 (87)
鲁迅与中国古版画·····	郑振铎 (95)
我认识的鲁迅先生·····	巴 金 (100)
心中的碑铭·····	白 兮 (105)
鲁迅先生·····	黄 源 (110)
一件小事·····	沙 汀 (121)

纪念中的鲁迅先生·····	征 农 (123)
回忆鲁迅为《绛洞花主》剧本作《小引》的经过·····	陈梦韶 (127)
毕生难忘的恩情	
——记鲁迅先生给楼炜春的几封信·····	楼适夷 (133)
鲁迅先生和青年·····	钦 文 (141)
鲁迅给我的指导、教育和帮助·····	赵景深 (154)
忆念鲁迅先生·····	黄 源 (161)
回忆鲁迅先生在写《文艺与革命》等两篇杂文的	
时候·····	董秋芳 (169)
忆鲁迅先生·····	以 群 (179)
怀念鲁迅先生·····	尚 钺 (185)
回忆鲁迅先生·····	陈学昭 (200)
忆鲁迅先生·····	孔另境 (206)
缅怀与感激·····	蔡 健 (212)
回忆我和鲁迅先生的一段往事·····	谭正璧 (217)
不逝的记忆·····	黄新波 (222)
鲁迅先生与“一八艺社”·····	江 丰 (243)
只研朱墨作春山·····	王朝闻 (254)
回忆鲁迅琐记·····	刘 岷 (258)
我们在鲁迅先生的教导下前进·····	李 桦 (263)
忆“木铃木刻社”·····	许天开 (273)
回忆鲁迅在广州的时候·····	许广平 (277)
记鲁迅先生轶事·····	蔡元培 (283)
和鲁迅先生在厦门相处的日子里·····	川 岛 (285)
回忆我和鲁迅先生的一次见面·····	许 杰 (298)
忆鲁迅先生·····	孙伏园 (307)
弟与兄·····	川 岛 (313)

伯父鲁迅的二三事·····	周 晔 (316)
鲁迅任绍兴师范校长的一年·····	理 直 (322)
五十年前的学友——鲁迅先生·····	厉绥之 (329)
我所知道的鲁迅·····	张宗祥 (331)
鲁迅先生与内山书店·····	王宝良 (335)
编 后·····	编 者 (339)

鲁迅与沉钟社

冯 至

近两年来，有几位同志劝我写一篇回忆录，谈谈鲁迅先生和沉钟社的关系。我几次拿起笔来，又放下了。因为更适合写这样文章的人是陈炜谟和陈翔鹤，他们二人跟鲁迅的接触比我要多一些，可是他们都先后逝世，再也不能写这段值得纪念的往事了。再者，回忆录属于文学领域，但也是历史的纪录，要求有历史的真实，它容许记忆略有差错，却不允许在记不起来的地方用想象来填补。我的记忆有限，可供参考的资料又少，我只能就自己想得到的事如实叙述，一定会挂一漏万，很不全面。幸而《鲁迅书信集》和《鲁迅日记》中记录着一些与沉钟社有关的事，给我提供了可靠的线索。从某种意义来说，这篇文章也可以说是那几条记录的注释吧。此外，我在两年前写过一篇题为《笑谈虎尾记犹新》的回忆短文，凡是那里提到的事，我这里也不再重复了。

一九一九年，爆发了震撼全国的五四运动。那时我是北京

第四中学三年级的学生，学校是四年制，还没有区分为初中和高中。在所谓国文的课程里，读的是《史记》、汉赋、唐宋古文，对于出版已四年之久的《新青年》杂志，以及先进的思想界所探讨的问题，我一无所知。可是五四运动以后，情况转变的迅速，虽不能说是一天等于二十年，但在一些青年的头脑里激起的巨大变化，却是过去历史上很少见的。人们从漫长的睡梦中惊醒，好象天天都有人在外边敲我们的门，传播新思想的刊物也不胫而走，流传到学校的宿舍里。我最早接触到的是《新青年》第六卷第五期，这一期可以说是马克思特辑，其中介绍和研究马克思学说的论文有七八篇之多。此外的文章中，有鲁迅的小说《药》和唐俟的随感录。一个同班的同学名戴昌霆，他指着鲁迅和唐俟的名字向我说，鲁迅、唐俟都是一个人不同的笔名，是他父亲教育部的同事，他常听他父亲说，鲁迅的思想如何深刻，学识如何渊博，他劝我仔细读一读这篇小说《药》。戴昌霆的父亲就是鲁迅在早期的日记里经常提到的戴螺舲，他精通艺术，是一个画家。

从《史记》、汉赋、唐宋古文转到鲁迅的《药》，是一个要费很大力气的跳跃。文字，当然比古文容易懂得多了，可是理解其中的涵义，并不容易。小说叙述在愚昧的社会里，用烈士鲜血浸染的馒头来医治肺病患者，而这肺病患者终于不免于死亡，全篇笼罩着阴森的气氛，读后使人郁闷，同时又觉得这是新的东西，是过去的读物里难以读到的。至于夏瑜的名字来源于秋瑾，夏瑜坟上的花环含有什么意义，是许多年后才明白了的。

此后，凡是鲁迅发表的作品，我都找来读，有的自以为懂了一些，有的并不懂。印象最深的，是鲁迅小说中最短的一篇《一件小事》。我记得清楚，在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寒冷的一天，我得到一份《晨报周年纪念增刊》，在课堂里听课时，我把增刊中发表的《一件小事》反复阅读，那人力车夫崇高的形象感动得我流下

泪来，老师在讲台上讲了些什么，我一句话也没有听进去。增刊里还有蒋梦麟的一篇文章，是针对当时全国各地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新文化刊物写的，作者摆着资产阶级老爷的态度，给这些刊物大泼冷水，他问，“这是筍的生长呢，还是菌子的生长？”那篇文章，就是用这样一句问话作为标题。两篇迥然不同的文章，登载在同一期的增刊上，形成鲜明的对照。

我是这样起始知道鲁迅、起始阅读鲁迅的作品的。沉钟社的其他成员对鲁迅的认识，每个人都会有类似的或者不同的一段经历，但我只能写出自己的经历作为这篇回忆录的开端。

一九一九年，林如稷从四川到北京，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读书，一九二一年，他转学上海。一九二二年，他在上海和十几个爱好文学的青年创办浅草社。浅草社编辑《浅草季刊》，由上海泰东书局发行，一九二三年下半年，又办《文艺旬刊》，作为上海《民国日报》副刊的一种。浅草社里，有不少人受到创造社早期的影响，成员中邓均吾、王怡庵从《创造季刊》一开始就在上边发表诗歌，林如稷、陈翔鹤在上海写的小说也有创造社影响的痕迹。我个人是通过郭沫若的介绍才知道歌德、雪莱、海涅等人的名字的。一九二三年，我在《创造季刊》二卷一期发表了二十几首诗，引起浅草社社员的注意，有人约我加入了这个文艺团体。

一九二三年暑假刚开始时，我结束了北京大学预科的学习，在北京的浅草社成员大约有十来个人，在中央公园（即中山公园）后河沿举行过一次茶会。这时，林如稷从上海来到北京，他在会上谈笑风生，绘声绘色地介绍了浅草社在上海的情况。这是浅草社在北京唯一的一次活动。当时，参加者对浅草社并不都很热心，平素很少交往，不久林如稷也到法国留学去了。这次

会却有两件事对我是有意义的：第一，我和陈炜谟在北大是同年级的同学，彼此并不熟悉，这次以后，则逐渐成为很好的朋友；第二，由于林如稷的介绍，我和那时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的陈翔鹤开始通信。

一九二三年暑假后，我在北大国文系教授张凤举的家里遇见杨晦，他辞去厦门集美学校的教职，回到北京在孔德学校教书。在这年年底或次年年初，陈翔鹤放弃了复旦大学的学习，来到北京，他唯一的理由是为了友情。我和杨晦、陈翔鹤、陈炜谟，很快地成为朝夕与共、无话不谈的朋友。

浅草社，由于它的积极组织者林如稷出国，社员的志趣并不一致，《浅草季刊》编好的稿子长期搁置在书局里一再脱期，《文艺旬刊》出了几个月就办不下去了……等等原因，到《浅草季刊》一卷四期慢腾腾地在一九二五年二月才印出时，浅草社这个文艺团体已经名存实亡了。

一九二五年秋，杨晦、陈翔鹤、陈炜谟和我商量另办刊物，取名《沉钟》，因而被称为沉钟社。原来浅草社其他的社员，除罗石君、韩君格（莎子）外，很少为《沉钟》写稿；至于杨晦和后来在《沉钟》发表小说的蔡南冠（蔡仪），则与浅草社没有过任何关系。《沉钟》无论在编辑方针和刊物内容上，都与《浅草》不同，如果说《浅草》是《沉钟》的前身，不过是如上所述的历史关系而已。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里谈到《浅草季刊》时说：“向外，在摄取异域的营养，向内，在挖掘自己的魂灵，要发见心灵的眼睛和喉舌，来凝视这世界，将真和美歌唱给寂寞的人们。”这与其说是浅草社，倒不如说更适合沉钟社的实情。那时，我们如饥似渴地阅读外国文学作品，海涅、霍卜特曼、莫泊桑、契诃夫、安特烈夫、史特林贝尔格……都是我们常常提到的名字。见面时，谁读了什么书，都互相介绍，谈论书的内容，书中的人物、情节，

以及精辟的警句；我们写的东西自然也受到那些读物的影响。与这些读物相配合，鲁迅的作品成为我们的教科书。

鲁迅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六年八月离开北京，怀着“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心情，写出《彷徨》、《野草》、《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以及《坟》里的一些重要文章。在这时期内，国内的形势一方面是北洋军阀反动政府对人民的残酷镇压，这镇压以一九二六年的三一八惨案达到极点，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迅速蓬勃发展。鲁迅个人，一方面在黑暗重重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经受一次又一次的理想幻灭，担当着无边的寂寞；一方面寄希望于将来，深信人类总是进步的，对一切阻碍进步事业的事物进行不懈的斗争；他一面解剖自己，一面向离奇古怪的“无物之阵”举起了投枪。象《祝福》、《在酒楼上》、《肥皂》、《离婚》，以及《华盖集》、《野草》里的一些名篇，每一发表，我们都抢着来读，当时的情景，是一个人读的，还是几个人共读，读后谈了些什么感想，或是朋友来信写了些什么读后感……回想起来，有的还历历如在目前，尽管我们的看法有时很不正确。我们经常把鲁迅和自己读过的一些外国作家相提并论，我们只反复吟味鲁迅笔下的悲哀情调，或是赞叹作品中尖锐的讽刺，但是对于鲁迅深刻的思想、精辟的社会分析、积极的战斗精神，是缺乏理解的。现在看来，前边引用的鲁迅对我们的评语，并不尽是溢美之辞，同时，言外之意也指出我们的缺点，我们只知道“摄取异域的营养”，“挖掘自己的魂灵”，但关于中国社会的实质一无所知，而鲁迅观察中国的社会，则洞若观火。

我们听鲁迅讲授《中国小说史略》，是一九二三年下半年起始的。他讲课时，态度冷静而又充满热情，语言朴素而又娓娓动听，无论是评论历史，或是分析社会，都能入木三分，他的言论是当时在旁的地方难以听到的。我们要求认识鲁迅的心情与日俱

增。在我们中间，首先鼓起勇气，写信给鲁迅，不久便得到鲁迅回信的，是陈翔鹤；首先到阜成门内西三条访问鲁迅的，也是陈翔鹤。这是一九二四年六、七月里的事。

一九二三年下半年，北京大学派经济学教授陈启修（陈豹隐）到苏联去考察，创造社的郁达夫到北京来，代替他在北大讲授统计学。郁达夫在课后，常到学生宿舍里找爱好文学的青年谈天，我们有时同他一块儿到城外郊游，逛旧书摊；陈翔鹤到北京后，同他来往的次数更多。陈翔鹤首次访问鲁迅，是跟郁达夫一同去的。据陈翔鹤生前回忆说，鲁迅给他写过一封长达三张信纸的信，信中对自己过去的消沉情绪进行自我批评，希望现在的青年不要象他过去那样。鲁迅的这种心情一再反映在他二十年代的著作里，正如《呐喊·自序》里说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是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鲁迅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五年，利用讲授《中国小说史略》的时间，把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作为讲义。这一学年，鲁迅课堂上听讲者的人数倍增，当时的盛况我在《笑谈虎尾记犹新》中已略有记述。这里我只想就个人的认识解释一个问题，鲁迅为什么要翻译而且讲授《苦闷的象征》这本书？厨川白村根据柏格森的哲学和弗罗特的心理学，认为“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而其方法乃是广义的象征主义。”这种唯心主义的观点是不正确的。鲁迅翻译并讲授这本书，只能说明鲁迅在这时期不只在政治上，而且在文艺思想上也在探索根本性的问题。这样的问题，《苦闷的象征》是回答不了的。所以鲁迅在讲《苦闷的象征》的同时，就在一九二五年四月为《苏俄的文艺论战》写前记，后来在一九二六年七月又为勃洛克的《十二个》中译本写后记，密切注意十月革命后苏联的文艺动态。最

后他认识到，文艺上的根本问题，只有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才能得到正确的回答，他在《三闲集·序言》里说：“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

这里还附带说明一件事。鲁迅在一九二五年四月三日的日记里写着：“午后往北大讲。浅草社员赠《浅草》一卷之四期一本。”这段记载引起我的回忆，跟我读《一件小事》时一样清晰。那天下午，鲁迅讲完课后，我跟随他走到教员休息室，把一本用报纸包好的《浅草》交给他。他问我是什么书，我简短地回答两个字“浅草”。他没有问我的名姓，我便走出去了。后来鲁迅在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写的《野草》最后一篇《一觉》里提到这一年前的往事时，却说是“两三年前”，可能是作者记错了。其理由是，《一觉》里说，“可惜那《浅草》不再出版了”，这当然指的是日记里写的“《浅草》一卷之四期”，也就是《浅草》的最后一期，而在《鲁迅手迹和藏书目录》第二册“期刊部分”中也只有一卷四期一册。

鲁迅的《一觉》里更多地谈到《沉钟》周刊，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沉钟》周刊从一九二五年十月创刊，出了十期，在社会上得不到任何反应，我们仅有的几个人，为它写稿子，为它跑印刷厂，为它到书店托人代售，遭受书商的白眼，不料在默默无闻不得不忍痛停刊后，却从我们最敬重的鲁迅那里得到肯定和称赞。那正是三一八惨案后一个月左右，全北京处在哀悼死难烈士和声讨反动政权的悲愤气氛中。大约是四月里的一个星期日，我一如既往地从小报童手中买到刚刚出版的《语丝》，当我在鲁迅的《一觉》中看到“浅草”和“沉钟”的字样时，我的心是多么意想不到地激动啊！那一天，我们好象度过一个小小的节日。作者在《一觉》引用了《沉钟》最后一期等于是停刊词的《无题》中一段话后，他写道：“是的，青年的魂灵屹立在我眼前，他们已经粗暴了，

或者将要粗暴了，然而我爱这些流血和隐痛的魂灵，因为他使我觉得是在人间，是在人间活着。”这段话是对于我们的期望，也是对一切青年的期望。但是我们辜负了这个殷切的期望，我们死抱着文学不放，过分夸大文学的作用，好象中国只要产生几部伟大的作品，就可以称雄于世界了，却不问伟大的作品怎样才能产生，也不反躬自问，象我们这样下去，能不能写出几本象样子的东西。《沉钟》无论是周刊时期，或是后来的半月刊时期，每一期在报头或第一页上都摘录一段古今中外诗人、作家的名言，这类名言说的，一般不外乎是生活如何艰难，人们应该如何勇敢地承担生活的痛苦，努力奋斗，坚持工作。至于苦难从何而来，斗争的对象是什么，我们是模糊不清的。所谓工作，不过是写点文章，翻译点自己爱好的外国作品而已。

在一九二六年五月到七月中间，我们到鲁迅家中去拜访的次数多了，鲁迅除了谈论文学与时事外，对我们也提出批评，他说：“你们为什么总是搞翻译、写诗？为什么不发议论？对些问题不说话？为什么不参加实际斗争？”这是对我们最大的爱护。我在李霁野《忆在北京时的鲁迅先生》一文中读到：“沉钟社的杨晦、冯至、陈翔鹤、陈炜谟，他都常提到，很喜欢他们对文学的切实认真的态度。不过他也觉得他们被悒郁沉闷的气氛所笼罩。鲁迅先生对我们的劝告，和这些情况有密切的关系。他曾多方面地鼓励我们，不使我们陷入消沉悲观之中”（见《文艺报》一九五六年第十三期）。鲁迅对青年成长的深切关怀，不是为了某些青年的个人，而是为了中国的前途，我们当时是体会得很不够的。

一九二六年八月，鲁迅离北京去厦门，不少青年学生纷纷南下，投身革命，北伐战争不断取得胜利，北京在北洋军阀政府的统治下，充满恐怖，暗无天日，成为一座死城。《语丝》周刊、《莽

原》半月刊继续出版,《沉钟》于停刊半年之后,由周刊改为半月刊,在七月复刊,前六期的封面是由鲁迅转托陶元庆绘制的。但是象一九二五、一九二六上半年每星期都能读到鲁迅新作品的岁月,已成过去,一切都死气沉沉,使人窒息。我和陈炜谟、陈翔鹤在严冬的夜里,有时到景山东街未名社门市部,找韦素园、台静农谈天。韦素园外表深沉朴素,但是谈起话来却非常热情,他滔滔不断地谈苏联内战时期他去苏联一路上遇到的艰难险阻,谈俄罗斯文学,谈他的弟弟韦丛芜的诗集《君山》是怎样写成的,至于主要的话题,则是鲁迅在厦门的情况,自然也谈到高长虹的问题。关于高长虹,我们跟韦素园的看法是一致的,他思想混乱,写的文章既晦涩又空虚,诚如鲁迅所说:“他除掉我译的《绥惠略夫》和郭译的尼采小半部而外,一无所有。”但是他狂妄自大,自以为能掀起一个席卷一切的狂飙运动,在上海成立狂飙社,出版《狂飙》周刊,怀着阴暗的心理,先是打着鲁迅的幌子,随后又拚命地攻击鲁迅。鲁迅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写给韦素园和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一日写给许广平的信中提到的高长虹的那首诗,是我们从认识高长虹的一个朋友那里听来的,我们在景山东街的夜话里谈到此事,韦素园写信告诉了鲁迅,鲁迅因而在《故事新编》的《奔月》里“和他开了一些小玩笑”。

《沉钟》半月刊出了十二期,又停刊了。但是从一九二七年起出版的《沉钟丛刊》,每种出版后都由作者寄给鲁迅,请他指教。我的第一部诗集《昨日之歌》出版后,我在一九二七年五月九日写信给鲁迅,并附寄《昨日之歌》一册。由于陈炜谟常常一半严肃、一半开玩笑地说我的诗缺乏时代气息,没有摆脱旧诗词中的情调,我把这个评语,作为我自己的看法写给鲁迅,并向鲁迅表示,我打算北大毕业后到广州去工作。过了些天,我收到鲁迅的回信,信里说,他认为我的诗并不象我信中所说,有那么多

旧诗词的痕迹；关于到广州去的事，他劝我慎重考虑，他说广州跟北京没有什么两样，他周围所遇到的仍然是他深恶痛绝的“正人君子”，他自己也在打算尽快地离开广州。遗憾的是，鲁迅的信我在抗日战争时期失散了。

鲁迅离开北京后，无论是在厦门，或是在广州，常常以沉钟社为念。《坟》将出版时，他在一九二七年一月十日给韦素园开到的赠送名单中有这样的话：“陈炜谟、冯至，上两人是沉钟社里的，不知尚在京否？如知地址，希邮寄。”在同年九月二十五日将离广州时，写信给李霁野说：“看现在文艺方面用力的，仍只有创造、未名、沉钟三社，别的没有，这三社若沉默，中国全国真成了沙漠了。”实际上从一九二七年暑假后，沉钟社朝夕相处的四人已经各自东西，归于“沉默”了。当我于一九二八年初在冰雪漫天的哈尔滨收到未名社寄来的鲁迅翻译的《小约翰》时，真是喜出望外，仿佛亲自见到鲁迅的容颜。那时我利用新年三天的假期写过一首长诗《北游》，在接到《小约翰》后，便把其中最后一句“他逆着凛烈的夜风，上了走向那大而黑暗的都市，即人性和他们的悲痛之所在的艰难的路”作为这首长诗的题辞，觉得很恰当。

一九二九年五月，鲁迅来到北京，在五月二十四日上午，我和杨晦、陈炜谟到鲁迅北京的住所去看他。阔别三年，人人都有了一些变化，只是他的住所却依然如故，室内室外跟过去没有两样。我们约他到中央公园午餐，一直谈到下午五时。鲁迅那天的谈话，很大部分都谈的是在这大动荡的时代，一些青年人使他感到失望。他也谈到编辑过《晨报副刊》和《京报副刊》“笑嘻嘻善于催稿”的某君，在“革命文学”论争热烈开展时，忽然在武汉也大发言论说，他跟鲁迅的政见不一致。鲁迅说过这事后，笑着说：“不知他有过什么政见？”在谈话过程中，间或有认识鲁迅的人走来跟他打招呼，其中有一个鲁迅在北京时教育部的同

事，见了鲁迅没话找话说，问到《呐喊》。这人走后，鲁迅说：“他们只知道我写过一本《呐喊》”。临分手时，鲁迅说：“游人减少了，现在的公园跟民国初年差不多”。他对于这种情况似乎感到满意。他这次来北京，许多朋友和学生希望他留在北京，也有一小部分人又怕他留在北京，但鲁迅不管这些，他如期回上海去了。

从一九三二年十月到一九三四年二月，《沉钟》半月刊又出了二十一期，主要由杨晦和已于一九三〇年回国的林如稷编辑。每期都寄给鲁迅。复刊后的《沉钟》依然保持着前十二期的精神，但是时过境迁，五、六年的时间，中国经历了很大的变化，《沉钟》则更显得无声无息，不为世人所注意了。

一九三五年九月，我从德国回国，路经上海，杨晦跟我和我的爱人姚可崑去看鲁迅，在内山书店附近的一座小咖啡店里谈了一个下午。鲁迅问我希特勒篡夺政权后德国的情况，我说了一些德国的政治笑话。他说“暴政统治下在人民中间最容易流传这类的讽刺”。他含有无限感慨地谈到韦丛芜。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红军撤退后，韦丛芜竟给 C. C. 头子陈立夫上条陈，为“扫荡”革命根据地出谋献策，因而被派到那里当县长。此外，我们谈到的大都是彼此认识的几个人的近况。鲁迅还告诉我们说，他在半年前为上海良友图书公司编选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里边选了《浅草》、《沉钟》中到一九二六年为止的一些小说，现已出版。这时，我在鲁迅先生面前所感到的，真有些象是鲁迅在这选本的序里所说的：“时移世易，百事俱非，他们是要歌唱的，而听者却有的睡眠，有的槁死，有的流散，眼前只剩下一片茫茫白地，于是也只好在风尘湮洞中，悲哀孤寂地放下了他们的筭篋了。”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下午，我和杨晦、姚可崑参加了鲁